

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分分合合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早年有师生之谊，并同列京剧“四大名旦”，后却一度分道扬镳，其间恩怨怨，扑朔迷离，长期以来世人为之困惑不解，本文试图揭开这一段尘封的历史，还梅、程两位大师由异质对峙，却异曲同工，最终殊途同归的真相。

仿梅学梅

程砚秋10岁拜名旦荣蝶仙为师学艺，合同期8年。后在诗人罗瘿公的帮助下提前出师，改从王瑶卿问业，并拜梅兰芳为师，执弟子礼。据程砚秋后来回忆，早在出师前，就常去观摩梅兰芳的演出。那时梅兰芳正陆续上演古装戏，他很爱看，天天从丹桂园下装后，就赶到吉祥戏院去看梅兰芳的演出。拜师后，梅兰芳给他说过《虹霓关》、《女起解》、《玉堂春》等剧。梅兰芳每天还给他留一个座，让他看自己演戏。梅兰芳又让程砚秋在自己演出的《上元夫人》、《天河配》、《大观园》、《打金枝》等剧中，扮过宫女、丫环。1920年12月，张謇在南通兴办的更俗剧场竣工，开幕前邀梅兰芳光临指导。梅兰芳有事难以分身，便特地给程砚秋说了《贵妃醉酒》，要程代



四大名旦合影：梅兰芳（右二）、尚小云（左二）、程砚秋（左一）、荀慧生（右一）

表自己往贺。在从梅学戏的这些日子，老师倾心相教，学生虚心好学，关系是融洽的。

程砚秋从13岁起搭班唱戏，一面学，一面唱，很多地方留下了学梅的痕迹。1920年9月，程砚秋与谭小培（老生泰斗谭鑫培之子）在北京华乐园合组玉华社，开演第一日，程、谭合演《汾河湾》，观众达千余人，盛

况空前，后至者皆向隅。《汾河湾》为梅兰芳早年经常演出的剧目。程砚秋在剧中饰柳迎春，其唱腔、说白、表情无不追步梅兰芳。当日戏毕，众多论者就已断定“继梅兰芳而起者自非程砚秋莫属了。”1921年，程砚秋搭名老生高庆奎的庆兴社，与高庆奎合演《打渔杀家》、《抢挑穆天王》等戏，程不只表情学梅兰芳惟妙惟肖，而且口



梅兰芳（前）与尚小云（右）、程砚秋（左）合影

齿清婉，意态隽妙，学梅已臻登堂入室之境，其时一般曲评家称之为“梅兰芳第二”。在历年的组班演出中，程砚秋给广大观众的印象是：“唱功确得（陈）德霖、（王）瑶卿之大体而参以自己之变化，做功得（梅）兰芳之神髓，表情极认真而周到，走式之佳可称独步，彼若专工青衣，则来日方长，造诣未可量也。”（剧评家苏少卿评，据上海《新闻报》）由此可见，尽管程砚秋跟梅兰芳学戏的日子不长，但受益匪浅，终身受用。

独立门户

1922年春节，对于程砚秋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罗瘿公的精心安排下，以程砚秋为首的和声社正式宣告成立，对外演出的第一出戏是新排的《龙马姻缘》。演出一炮打响，立即轰动了北京，自此，程砚秋走上了独立挑班的道

路。和乃师梅兰芳一样，独立门户的程砚秋也相继迈出了赴沪演出、编演新戏和出国取经这三大步，为谋进一步发展，自成一派，领袖群英，拓展了无尽的空间。

梅兰芳于1913年首次赴上海演出，呼吸到了海上新空气，由此开启了对京剧艺术的革新。程砚秋走红后，也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龙马姻缘》轰动北京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丹桂第一台诚邀和声社到上海演出一个月。1922年10月8日至11月9日，程砚秋首次赴沪演出于亦舞台，连演12天，天天爆满。接着上演的《梨花记》、《花舫记》，也大受欢迎。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盛赞程的表演艺术，

论者咸称“除梅兰芳外断无第二人色艺兼全者如玉霜”（程号玉霜）。1923年程砚秋第二次抵沪，更为轰动。

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回北京后，即在齐如山先生协助下，在时装戏、古装戏、新编历史戏和昆曲等四个方面进行革新创造，创作排演了三十多出新戏，由此奠定了梅派的艺术地位。程砚秋也十分重视编演新戏。他自上海回北京后，在两年时间里集中排演了《红拂传》、《花舫缘》、《玉狮坠》、《风流棒》、《鸳鸯冢》等一批新戏，大都由罗瘿公编剧，王瑶卿导演。罗病故后由金仲荪先生执笔。至1948年冬，共排演二十七出新戏，程砚秋在致上海的挚友袁伯夔的信中，写到新戏《青霜剑》在天津的演出情况：“《青霜剑》已在星期六、星期日两次演唱，上座很好，台下非常欢迎。此戏情节极悲，看客多下泪，星期日包厢内有一女客忽然失声

号哭，可见此戏尚能感动人。”程砚秋编演的新戏，大多类此。这也是程派所以风靡大江南北的一大原因。

梅兰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分别到美国和苏联访问演出，一方面把中国的京剧艺术推向世界，一方面考察美欧戏剧，从中汲取养分。同样，程砚秋也深以个人学识浅陋，决计赴欧留学。1932年1月13日，程以南京戏曲音乐院副院长的身份，只身一人，赴法国考察戏剧。在出国前，他正式改名为砚秋（原名程艳秋），字御霜，以示玉洁冰清，御风霜当有自立之志。程此次出游，历时一年半，欧洲的话剧、歌剧、芭蕾舞剧、交响乐以及舞台美术、灯光、音乐伴奏等，都引起了他的浓厚的兴趣，给他以深刻的启迪。他在《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中，提出了京剧改革的19条建议，并从他自己开始改革，对京剧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期的独立挑班、自立门户，程砚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在青衣界的地位扶摇直上，后来且与梅兰芳争一日之短长，成为梅兰芳第一个真正的挑战者。

分庭抗礼

从1924年起，程砚秋分别在和声社和鸣盛社挑头牌，俨然独当一面。程砚秋的声势冠于京师，一人支持全局，名旦尚小云、徐碧云皆大受影响，梅兰芳且退避三舍。当年上海《新闻报》刊载笔名“通公”的一篇文章，分析了程砚秋异军突起、后来居上的情况：“剧界自创造家谭英秀（鑫培）逝世后，须生一门，群奉谭为金科玉律，得其一鳞一爪辄自矜喜。墨守陈规不敢少有异同或别有发明，人才消歇可叹也。唯且一门，人才辈起，其力量均足以创造而又能不相因袭独成一家，吾于此得三人焉，一曰王瑶卿，一曰梅兰芳，

一日程砚秋，诚不能不谓剧界之三杰也。”这或许是剧评界第一次将王、梅、程相提并论。遁公的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的结论：“以三人之地位论，王开其端，梅臻其盛，程集其成；以三人之时代论，王为过去，梅为现在，程为未来。”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首届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四大名旦”，依次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竞选活动的结果，印证了遁公文章的结论。

“四大名旦”的排序最早是梅、尚、程、荀，逐渐是梅、程、尚、荀，最后则是梅、程并称，瑜、亮一时，实在是名至实归，宜乎其然。从四大名旦相互间的关系看，尚、荀两人与梅只是暗“斗”，唯有程砚秋雄心万丈，与梅由暗“斗”趋向明争，一时间，程砚秋的呼声很高。1924年3月，关东王张胡子（作霖）五十大寿，在奉天（沈阳）举办祝寿堂会，京中名伶被搜罗殆尽，惟声明不要梅兰芳，而以艳秋代之，京中大哗，以为异事。1926年6月，程砚秋率鸣盛社成员一行12人，第一次赴香港演出。有为程砚秋吹捧者，特出“艳刊”一张，谓“程郎之艺术远胜于梅郎”。剧院之广告，亦抑梅而扬程。程砚秋见后，歉然不安，谓受之者赞誉过当，反失渠师弟感情，力请以后不可如此。但好事者热情不减，益发推波助澜。《北平晨报》刊出笔名为“老太婆”的专栏文章，推出“程砚秋主义”讲座，称“皮黄史的发展现在是程砚秋时代”，将程砚秋推崇到了极点。

梅、程本为师生，见程有凌驾其师而上之势，梅之友好多为不平。梅、程两人各有拥护者，故成两大派之势，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两人对抗而不相上下。特别是1924年奉天祝寿堂会，程砚秋每剧必安排在倒第三，胡子（张作霖）每听完程剧即行入

内，座客随之散去大半。程砚秋之红极，大为同业所忌，是非丛生，掀起风浪。

罗瘿公屡戒砚秋对乃师梅兰芳当在不即不离之间。罗瘿公与梅兰芳认识很早，与齐如山也是熟人，罗瘿公1924年9月病故后，梅、程关系从此失去了一个呵护人。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梅、程关系不融洽，已是庸庸讳言的事实。程砚秋在给上海袁伯夔的信中，对此中缘由有详细告白：“自去年（1923年）梅先生返京后，梅派拥护者对秋时时冷嘲热讽，不过一面骂一面又来包围，天天来秋索要打牌，秋为敷衍面子计又素性好牌，不知不觉混了两三个月，几乎调嗓子都没有功夫。后知情形不对，即立意戒赌，与他们疏远些，他们以包围不成又用压力。今春师生生辰，前往叩贺，因他事未吃饭，一饭之细便犯了如此大罪。因秋常到瑶卿家研究腔调，他们便在王家大用离间，瑶卿一一告知。春间罗先生无病时新编之戏，编成后七天即开演，他们大起恐慌，说七天就排一戏，那还了得，其余破坏之事很多，一言难尽。梅宅丧事（指梅的伯母去世），罗先生代作一挽联，中有‘谗口中人’一语，他们即在几家报纸上痛骂，明白开战了。与秋好者亦在报上还骂，秋苦劝不听。不料宣战后，他们便又停战，忽又大变态度。罗先生去年病后，他们未去看一次，近日非常殷勤，全体出马，一面专造谣言，破坏秋的名誉。现在是造谣的时期了，将来此等谣言恐怕愈出愈奇了。上海方面，还望您代为说明，报纸文章等抄好寄上。此间友人说，他们既停战亦不再还口，不过他们变刚为柔，更不能不防备了。”

虽然程砚秋见了梅兰芳仍执弟子



程砚秋赠送梅兰芳的个人照（1918年）

礼，但隔膜已是存在，一时恐难消除，而且还出现了两次打对台的尴尬局面。1936年、1946年，梅兰芳和程砚秋分别在北平和上海两度对台，虽然双方均力求艺术上的争胜，并未沦为恶意的争斗，但梅、程都意在一决高低，未免有意气用事之处。对此，梅、程各有说法，莫衷一是，梅、程之嫌隙由此毕露于世。

殊途同归

程砚秋是梅兰芳所收的第一个弟子，但由于他们的秉性和天赋各异，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两条风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发展道路。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处于不自觉的异质对峙状态，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切和忧虑。

国民党元老、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李



梅兰芳（左）与程砚秋（右）演《西厢记》

石曾很早就向梅、程提出过弥合裂痕、殊途同归的忠告。1932年1月5日，梅兰芳于北平缀玉轩为即将游学欧洲的程砚秋举行欢送大会，李石曾应邀出席。梅兰芳首先致欢送词：“今日，兰芳为程玉霜君赴欧洲游学开欢送大会，承诸位先生光临，兰芳甚为荣幸。玉霜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相交有十余年，我相信他的聪明才力，远在我辈之上。他现在将赴欧洲游学，实系中国艺术界最大的荣誉，不过我的知识有限，不能供给意见，还望诸位先生加以指导。”梅兰芳的这番话，实出自肺腑，并非过谦之词。李石曾1930年与程砚秋合作创办中华戏曲音乐院，熟悉梨园界的情况，自然清楚梅、程这几年来种种“过节”。听了梅兰芳的欢送词，他有感而发，说了下面一席话：“兄弟以为宇宙间的事理，无绝对的统一，亦无绝对的分立，故国家政治社会事业，皆须分治合作，戏剧亦社会事业之一，何独不然。是以兄弟对于梅程两位先生，亦希望其分治合作，因为梅程两先生有

相同的地方，亦有相异的地方，各有其长，正须分治合作。前年，梅先生赴美演剧，是将成熟的艺术，介绍于西方；现在，程先生赴欧游学，是考察西方的艺术，将以改良中国的戏剧，取径不同，就是分治合作的表现，将来殊途同归，必成为整个艺术。犹之梅先生办理北平戏曲音乐院，程先生办理南京戏曲音乐院，分治合作，成为一个戏曲音乐院。”李石曾的分析，大体符合梅、程两人的实际情况，所提“分治合作”以求“殊途同归”的主张，也极具说服力，梅、程听后，当有所感悟。程砚秋在致答谢中这样说道：“砚秋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原来出国求学，是极普通的事，不值得社会上的注意。今承梅先生的欢送，是老师以糖果给小孩吃，奖掖他用心读书，砚秋是很感激的。梅先生的学问才力，都很高超，所以把中国的戏剧介绍于西方，砚秋的确知识有限，所以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话语中隐含着回应李石曾忠告的意愿。惜乎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梅、程都没有可能将这种意愿付之实际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才为梅兰芳、程砚秋这两位大师的“分治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解放初，梅兰芳和程砚秋分别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和副院长，开始了他们长达8年的合作共事。新社会的飞跃前进，向戏曲界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历史任务，这就是戏曲如何推陈出新，以更好地反映当代人民的新生活，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梅兰芳、程砚秋正是沿着这一大方向而共同努力着，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由于程砚秋身体发胖，而且多病，不能经常演出，因此他侧重于戏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曾在中国戏曲学校讲课，并到各地考察戏曲情况，行程数万里。梅兰芳则克服各种困难，不辞辛劳，每年深入工矿、

农村、部队，热情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演出。梅、程有一个共同点，即两人都特别关心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他们不倦地为戏曲青年们做报告，说身段，讲字音、唱腔，尽心地将自己的艺术创作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他们摒弃门户之见，不问是哪派弟子，只要向自己求教，他们都无保留地倾囊相教，为戏曲事业后继有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更为可贵的是，此时的梅兰芳和程砚秋更多地看到了对方的长处，惺惺相惜，取长补短。程砚秋去世前不久到山西讲学，他盛赞梅兰芳所演的《贵妃醉酒》，坦认自己早年从梅先生的艺术中受益匪浅。梅兰芳则更是充分肯定了程砚秋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另辟蹊径的艺术创造。他在《追忆砚秋同志的艺术生活》一文中，特别赞扬程砚秋“行腔有时高亢激昂，有时若断若续，如泣如诉，这种声音和这种唱腔演悲剧是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的，所以像窦娥这一类型的角色，砚秋都演得格外动人。《六月雪》这出戏，我也演过不知多少次了，比起砚秋却自愧不如。”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梅兰芳对他和程砚秋的关系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并得出了和当年李石曾相类似的结论：“我们两个人在艺术进修的程序和师承方面是差不多的，像陈德霖、王瑶卿、乔惠兰……等几位老先生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由于我们本身条件不同，所以根据各自的特点向前发展，而收到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正是有了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梅、程两人才得以捐弃前嫌，关系重归融洽。梅兰芳在为《程砚秋文集》的亲笔题词中有“今抚遗篇，泫然泪下”之句，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至深。虽然由于程砚秋先生英年早逝，梅兰芳先生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分治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为京剧事业所作出的不同贡献，恰如两座各呈异彩的艺术高峰，将永世并立。（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